

“屈于生而伸于死”

——中日苏轼研究比较的对话

曾枣庄 [日]池泽滋子

曾枣庄，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主编有《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早年从事杜甫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诗汇评》（全四册）、《苏词汇评》、《苏文汇评》、《论西昆体》、《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文星璀璨——嘉祐二年贡举考论》，与多人合著《苏轼研究史》，与吴洪泽合注《苏辛词选》，合编《宋代辞赋全编》、《宋代文学编年史》。目前正在撰写《儒学辨伪》、《中国文体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体资料汇编》、《宋文粹》。

池泽滋子，日本东京人。现任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从事苏轼研究、《西昆酬唱集》研究等。著有《丁谓研究》、《苏轼研究史》（第十章）、《日本的赤壁会与寿苏会》、《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等，目前正从事西昆派刘筠研究。

一、“经纶不究于生前”

曾枣庄 苏轼（1037—1101）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是历代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就时代看，南宋、清代和最近三十年，苏轼研究成果最多。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称其“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前一句概括了苏轼“生前”的遭遇，后一句概括了他“身后”历代对他的评价。任何名世的文学家几乎都是悲剧人物，任何传世的文学名著几乎都是悲剧作品，苏轼也不例外。我研究苏轼，常常为他的伟大抱负及他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

感动，也常常为他的理想无法实现而哀叹。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总想“致君尧舜”（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竟“致”出了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在他死后二十七年，北宋就灭亡了。苏轼生前历尽荣辱浮沉，在他未仕以前，因为与他人没有利害关系，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好评。而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斗争以后，他的一些师友门生仍对他推崇备至，而变法派却把他骂得一钱不值，甚至把他投入监狱，一贬再贬。苏轼生前不但未能实现其“经纶”，也未得到公正的评论。宋仁宗读到苏轼兄弟的应试文章，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

传》)。但苏轼一生从未获得相位,相反,他从仕四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贬所度过的,以至他在临死前发出了“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皆苏轼贬所)”(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的沉痛哀叹。

池泽滋子“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确实颇能概括苏轼生前、身后的遭遇。我国长尾雨山在《乙卯寿苏录题词》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公殆屈于生而伸于死矣,乌乎,是岂天也欤?抑所谓盖棺论定也!”但他的不幸经历无损于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也许正是这种不幸经历才玉成了他巨大的文学成就。

曾枣庄正是如此。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他的诗、词、文融儒、释、道为一体,充满了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避等看似相互矛盾,实际又颇为统一的思想。在他那看似轻松达观、游戏嬉笑的文字深层,隐藏着他痛苦的思索、彷徨、哀叹、呻吟。读他的作品,看不到他的眼泪,但感觉得到他的心在流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认为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认为苏轼是悲观厌世者。他们各说对了一半,苏轼恰恰是这看似矛盾的二者的统一。其《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达观,也是悲观,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是一篇气壮山河的作品,也是感慨万端的作品。他本希望像“千古风流人物”和三国时的“多少豪杰”那样建立功名,特别希望像“公瑾当年”那样少年得志。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哀叹。他的《赤壁赋》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贬官黄州的苦闷。作者通过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声,引出了主客间关于人生意义的一场对话,实际上都是作者的自白。作者通过客人之口说,像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英雄,都被时间的流水洗尽了陈迹(“而今安在哉”),何况自己已经“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呢?“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人生太渺小了,太短促了!作者又不愿沉浸在这种悲凉的思想中,于是搬出老庄的处世哲学来自我安慰,掩藏着难以排解的苦闷。

池泽滋子“议论常公于身后”,似乎不只“身后”,他“生前”的影响就很大。

曾枣庄是这样,其诗文生前刊刻之多、流传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人。苏轼刚死,苏辙为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就说:“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可见东坡七集,当时已有六集,只有《东坡续集》为明人补编。此外还有三苏父子合著的《南行集》,苏轼兄弟合著的《岐梁唱和诗集》,成为乌台诗案罪证的《钱塘集》(通判杭州时的诗文),陈师仲编的《超然集》(知密州时的诗文)、《黄楼集》(知徐州时的诗文),熙宁末年行世的《眉山集》(王安石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知颖州与赵令畤、陈师道唱和,有《汝阴唱和集》。苏轼生前,其诗文的“镂版行世”,基本上都是旁人特别是书贾所为。苏轼《与陈传道书》说:“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这“市人”即指书贾。苏轼诗文被书贾大量刊刻,除反映了北宋印刷业的发达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这就是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责,作品虽被严加禁毁,却仍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苏轼只对刘沔编录的苏轼晚年诗文集二十卷较满意。苏轼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对邻国也影响很大。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诗云:“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颖士指唐代的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对策第一,名播天下。当时日本(倭国)遣使入中国,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颖士声名动倭国”即指此。乐天指白居易,鸡林,古高丽地名,代指朝鲜。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谓“鸡林贾人求市(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苏轼生前对朝鲜已很有影响,出身高丽名门望族的金覲,以苏轼兄弟之名为其二子取名为金富弼、金富辙(徐兢《宣和奉事高丽图经》卷八《人物》),可见他对苏轼兄弟的崇拜。但“颖士声名动倭国”只是作为“乐天辞笔过鸡林”的衬笔,

还是实录？苏轼的声名当时是否已经震动日本？

池泽滋子 作为苏轼门人的秦观讲“颖士声名动倭国”，恐怕必有所本。中日文化交流在远古史前时期就已开始，在公元3世纪中国典籍已开始传入日本（见日本《古事记》、《日本书记》）。在8世纪以前，中国典籍主要通过人口迁移流传日本。在中国唐代，日本皇室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带回大量的中国典籍，当时中国图书多已传至日本。中国的著名文人如王维、储光羲、李白、刘禹锡等等，都曾与日人唱和，留下不少佳话。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代中日文人相互唱酬的盛况，在宋代见不到了，宋代中日文化交流远逊于唐。但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如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裔然曾乘商船至台州，次年到京城开封，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回《孝经》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可见日本典籍已流传到中国，而一些在本土失传的中国典籍也从日本回流。咸平六年（1003）又有日僧寂照奉师源信之命，渡海来华向四明名僧知礼问天台教义，知礼《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收有源信来函及知礼《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寂照继又入京，进金字《法华经》。天圣六年（1028）又有日僧绍良奉师命来华向知礼的嗣席文智问疑十条，并以金字《法华经》为贽见礼，文智亦详为解答。欧阳修《日本刀歌》有“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句，可见不仅僧侣，还有商贾都在中日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他们，苏轼“声名”已“动倭国”，不是不可能的。但苏轼著述是否在他生前已传入日本，没有明确记载。

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苏轼研究高峰 与“苏学行于北”

曾枣庄 南宋王朝认为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特别推崇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政治上为他恢复名誉，建炎二年（1128）五月追复端明殿学士，绍兴元年（1131）八月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九月，赐谥文忠，九年（1173）二月特赠太师。孝宗在《苏轼文集序》中，对苏轼作了很

高的评价，称其“忠言谏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可谓一代文章之宗！”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苏轼著述大量刊刻，其诗词文皆有人作注。文有郎晔编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词有傅幹的《波坡词》，苏诗更号称百家注，既有分类注，又有编年注。分类注如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过去有人怀疑此书注者，今人卿三祥已令人信服地证明实为王十朋注。编年注有施元之、顾禧、施元之之子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南宋对苏轼生平也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各种苏轼年谱不下十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苏轼研究高峰。

池泽滋子 中日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但这“水”是大海，比之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高丽，似乎要慢半拍。苏轼生前，其著述是否流传到日本，虽无确证，但南宋年间肯定已传入日本。日本两足院藏有《东坡集》，是南北宋之际中国刊刻的，可能因为战乱关系，在中国各图书馆既无传本，各种目录书也无著录。可能当时偶然为一日本僧人带到日本，至今存世，成为国宝（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初探》）。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入宋僧园尔（圣一国师，1202—1280）从中国带回图书数千卷，藏于京都东福寺普门院。其中有《注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惜已佚传。托名苏轼所作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却保存下来了，收藏在东洋文库。

曾枣庄 10世纪至13世纪，在中国北方相继出现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就是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辽、金都未能统一中国，而元不仅统一了中国，并使领域空前扩大，横跨欧亚。辽、金、元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十分注意学习汉文化，金、元的文学成就尤高。翁方纲说：“有宋南渡以后，程（颐）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石洲诗话》卷五）翁方纲主要指金代，但用来概括辽、金、元也未始不可。元祐初，苏轼的《眉山集》在契丹已广为流传。苏辙出使契丹，在《神水馆寄子瞻兄》中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其《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述契丹臣僚曾对他说：“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契丹自己还曾刊《大苏小集》。王辟之说：“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渑

水燕谈录》卷七)可见苏轼诗文不仅在契丹臣僚中广为流传,而且在契丹民间也广为流传;不仅《眉山集》已传入契丹,而且契丹自刻有《大苏小集》。

金代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的南宋并世,更不可能不受南宋文坛的影响。钱谦益《题中州集钞》说:“自靖康之难,中国文章载籍,捆载入金源,一时豪俊,遂得所师承,咸知规摹两苏。”宋荦云:“金初以蔡松年、吴激为首,世称‘蔡吴’体。后则赵秉文、党怀英为巨擘,元好问集其成,其后诸家俱学大苏。”(《漫堂说诗》)金初苏学之盛,多由南宋使金文臣被留之人所促成,如宇文虚中出使金廷,为金所留,加以官爵,金人号为国师。后以谋反罪诛。有诗云:“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施德操《北窗炙轂录》卷上)颇能代表被迫留金文士的心情。又如朱弁使金被扣留十七年,在金著并刊刻《曲洧旧闻》十卷、《风月堂诗话》三卷,其中有不少对苏轼的记述,对在金传播苏轼作品起了一定作用。金代系统评论宋诗特别是苏轼的应推元好问(1190—1257),他对苏轼非常仰慕,其《学东坡移居》诗表示“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他的诗文风格颇近苏轼,屹然为一大宗。虞集(1272—1348)祖籍仁寿(今属四川),作为苏轼乡人,他对苏轼也十分崇敬,其诗、文、词风格都颇类苏轼。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说:“虞文靖公承故相之家,本草庐之理学,习朝廷之故事,择文章之雅言,盖自北宋欧、苏以后,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所谓“苏学盛于北”主要是指文学创作而言,对苏轼的研究根本不能与南宋媲美。孙镇字安常,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进士,官陕令。八十四岁卒,著有《注东坡乐府》。元好问编有《东坡诗雅》,另编有《东坡乐府集选》,是就金人孙镇《东坡乐府注》精选的。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有《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世称元延祐本或云间草堂本。这是元人对苏词的最大贡献。卷首有叶曾序,称东坡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指责“好事者或为之注释,中有穿凿甚多,为识者所诮”,自称“用家

藏善本,再三校正一新,刻梓以永流布”。全书按词调编次,共收苏词68调,281首。叶曾用作“校正”的“家藏善本”,可能包括了南宋傅幹的《注坡词》及曾慥所辑《东坡长短句》,故能兼傅本、曾本之长,而又有所增订。现存于国家图书馆,200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此书。

池泽滋子 元代立国很短,同期的日本对苏轼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有日本文和二年(1353)即元代至正十三年,日本东福寺大道一以(1292—1370)整理普门院藏书,编成《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此目录中的书多半是普门开山祖圆尔从中国带回的,著录该寺所藏的102种汉籍外典中,就有前已提及的《注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这是现在所知苏词在日本的最早著录。

三、五山禅僧笑云清三及其所编 《四河入海》

曾枣庄 从南宋开始的唐、宋诗之争,到明代以尊唐派占优势,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宋诗大受冷落。宋荦《漫堂说诗》云:“明自嘉(靖)、隆(庆)以还,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訾,故宋人诗集,度阁不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人对苏轼的研究既落后于前之南宋,更不能与后之清代媲美。明人对苏轼生平、苏轼作品没有作过深入研究,明人几乎没有自编的苏轼年谱传世,也没有明人自注的苏集传世。但正如清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所说:“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此语可用来概括明、清的所有尊唐派。即使他们对苏轼有所批评,但也掩盖不了他们对苏轼的喜爱。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说:“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明代文学的突出特点是宗派林立,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这些不同的文学流派的文论主张、文学风格各不相同,但对苏轼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肯定。元末明初的苏伯衡,字平仲,是苏辙远孙。他博览群籍,善为古文。元末贡于乡,明初入礼贤馆,擢翰林编修、翰林学士。著有《苏平仲集》。从《跋先文忠公墨迹》、《跋先文忠

公和韦诗后》、《书读〈易〉后》可看出,他对苏轼十分崇敬:“夫当窜责放逐之日,流离道路之际,而游戏翰墨,字势笔意无秋毫不足之意,则公之超然自得,夷险不改其度,抑亦可见矣。”“夫《易》之为书,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为诸儒之说乱之也……文忠之书,非为应有司之问而设。”(《苏平仲文集》卷一〇)宋濂《苏平仲文集序》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安公(苏洵)之变化瑰伟,文忠公(苏轼)之雄迈奔放,文定公(苏辙)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同为蜀人的杨慎对苏轼尤为推崇:“苏文忠公,宋代诗祖。”(《升庵集》卷三《周受庵诗选序》)前人有所谓明人刻书而书亡之语,讥明人所刻书错误很多。这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新编了几种苏轼集,对宋代的苏轼集多有补充,尽管真伪杂陈,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真正的东坡佚诗、佚文。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苏轼文集》以明末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就充分说明了明人搜集苏轼佚文之功。都穆说:“苏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过者。予顷见公诗真迹于友人家,皆集中所不载。诗凡五首,前题云《村醪二尊献张平阳》。其一云:‘万户春浓酒似油,想须百瓮列床头。主人日饮三千客,应笑穷官送督邮。’”(《南濂诗话》)何孟春《余冬诗话》卷下就都穆所辑感慨道:“东坡诗真迹流落人间,本集不收者多矣。”可见明人也曾留心苏轼的辑佚。

明代评点派流行,他们翻刻或编刻的各种苏轼诗词文选评本,无疑有利于苏轼作品的普及。有专选苏轼诗的,如袁宏道选、谭元春评的《东坡诗选》;有诗文或诗词文皆选的综合性选本,如钱士璠的《苏长公集选》二十二卷,陈梦槐的《东坡集选》五十卷,崔邦亮的《宋苏文忠公集选》三十卷。专选苏轼文的尤多,如闵尔容辑评的《苏文忠公文选》六卷,张溥编选、吴伟业评点的《苏长公文集》六卷,唐顺之的《苏文嗜》六卷。苏轼形式灵活的小品文尤为明人所喜,袁宏道《苏长公合作引》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专选苏轼小品文的有李贽选评的《坡仙集》十六卷,王圣俞选评的《苏长公小品》二卷,李一公选、吴亮辑评《苏长公密语》六卷,陈仁锡选评《苏文奇赏》五十卷,题杨慎编注、袁宏道辑评《三苏文范》十

八卷(卷五至卷一六为苏轼文)。

池泽滋子 曾先生曾引清末民初陈衍(1856—1937)的话说:“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及之者。”(《石遗室文集》卷九《知稼轩诗叙》)日本的情况刚好相反,是在镰仓、室町时代(14—16世纪),即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明代,苏诗才“风行”起来,集中表现就是日本五山禅僧的苏轼研究及其所编注的《四河入海》。五山是指京都、镰仓分别有的五个大寺庙。镰仓的五山是建长寺、园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的五山是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还有南禅寺,在京都五山的上层)。以这些五山禅僧为中心,中国诗文的创作活动和研究很盛行。这些五山禅僧做的诗文叫做“五山文学”。镰仓时代有入了日本籍的宋僧一山一宁和他的门人虎关师炼、雪村友梅等人。他们是后来五山禅僧的中国诗文创作的先驱。从日本南北朝时代到室町时代前期(14—15世纪)“五山文学”的活动很昌盛,在那个时代不断涌现出了中岩圆月(虎关的门人,曾入元)、义堂周信、绝海中津(他们是梦窗疏石的门人)等伟大的诗人。室町时代后期(16世纪前期)在五山僧之间广泛地流行阅读《三体诗》、《古文真宝》,杜甫、苏轼、黄庭坚的别集,并出版了很多注释本。就在这个时候(1534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五山禅僧笑云清三编了苏轼的讲义录《四河入海》。

曾枣庄 笑云清三是怎样的人?

池泽滋子 笑云清三是明应、永正年间(1492—1520)人,临济宗圣一派的僧侣。法讳清三,道号笑云。伊势人,俗性不详。在伊势无量寿寺严伯通噩处参禅,以后入京为东福寺大慈庵塔主。在东福寺,他重新建造山门(妙云阁),为修复东福寺做了很多努力,后来他去美浓,住在梅花无尽藏邻近“容安斋”,以万里集九为师,抄写《帐中香》。他在《古文真宝》、《无量寿禅师日用清规》、《敕修百丈清规》等书里加过注释,撰述《四河入海》。他曾重建天得庵,兼任天得庵塔主。在晚年接受建长寺的公帖,登上东堂位。

曾枣庄 《四河入海》是怎样一部书?

池泽滋子 这是一部日僧集注的苏轼诗。笑云清三在《四河入海后记》中说:“此抄者集北禅和尚《胜

说》、慧林和尚《翰苑遗芳》、一韩《翁听书》、万里居士《天下白》,以题句下,故名曰《四河入海》也……大永七年(1527)丁亥始笔,天文三年(1534)甲午绝笔矣。字字鲁鱼,句句传传,庶几后君子以是正焉。”(本文所引日本苏轼研究资料均见《苏轼研究史》中池泽滋子所撰第十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池泽滋子《日本的赤壁会与寿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笑云清三从1527年到1534年共花八年时间撰写这部《四河入海》。《四河入海》这个书名是集成以上四部书的意思。大痴贤谄此书《后跋》对笑云清三及《四河入海》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笑云清三和尚者,势(伊势)之奇产也。自幼好学,手不释卷、臂不离案者,四十有余年,至老益壮也,读书既破万卷矣。最殚思于苏玉堂(轼)之诗也,校雠本邦《胜》、《翰》、《白》诸抄,受业师一韩《翁听书》,抄合成一集而分卷为五十,名曰《四河入海》。譬诸江、河、淮、济之四滨,流入大洋者耶……四翁注释之余波,樗万斛舟抬巨灵乎。诚可谓雾海南针,夜途北斗也。东涌西没,南涌北没,无处不究其渊源。乌呼,至矣,尽矣,不出巷而知大宋天下者,其惟斯一集耶。嗟夫先生,在汉为邹阳,在唐为乐天(白居易),在宋五祖戒(苏轼),在元虞邵庵(集),今在日东盖非师其谁欤,我又何言乎。所希使学者誉写,漫于四海,亦使后人传写之,复使后人传之无穷。”

曾枣庄 此书与中国的集注有何不同?

池泽滋子 类似。《四河入海》的底本是《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此书的元刊本传到日本,有很多翻刻本。其集注方式也与《王注苏诗》相似。苏轼的原诗是大字,注释是小字。所集四书用简称,《芳》是《翰苑遗芳》,《白》是《天下白》,《一》是《一韩翁听书(蕉雨余滴)》。基本上每首诗题下都用《翰苑遗芳》和《天下白》考证作诗年月和作诗时苏轼的情况。然后是苏诗正文。注释方法是先分段,然后从诗里选重要的词语或句子把四个注释汇集起来。《四河入海》的底本是《王注苏诗》,但所引《翰苑遗芳》的注文用了大量《施注苏诗》的注释。现存的宋刊《施注苏诗》残缺不全。《翰苑遗芳》所用施注是完整的施注。《翰苑遗芳》最大价值就在于此。1965年日本出版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苏轼佚注》,就从《翰苑遗芳》中采集数千条施注。

四、日本赖山阳的《增评唐宋八大家读本》和《东坡诗钞》

曾枣庄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继而清军入关,建立了女真族的清王朝。清王朝是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汉化程度最高的,对中国历代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先后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等大型类书和总集。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回光返照,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清代苏轼研究取得了元、明不可比拟的成就,成就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苏轼研究高潮。清人对苏诗进行了系统整理,不仅继续整理刊刻历代广泛流传的《王注苏诗》,而且整理出版了《施顾注苏诗》。清人自己也注释苏诗成风,先后有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证》等。明代的评点派多评苏文,特别是苏轼的小品文,清代却评苏诗成风,代表作有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中的苏诗评、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纪昀《评苏文忠公诗》、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温汝能《和陶诗笺》、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清人诗文集、总集、诗话、笔记评及苏诗者也很多,其数量超过清以前的总和。清人之所以评注苏诗成风,是因为从宋代开始的唐、宋诗之争,清代以宋诗派占优势,他们为纠正明人的“诗必盛唐”,故推重宋诗以矫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著录《精华录》有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张崇兰《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序》说:“国朝诗人厌薄明代摹仿唐贤风气,力矫其失,一以清快透脱为宗,而苏诗于是乎盛行。二百年来,家置一编,五尺童子,皆能上口矣。”(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首)清代的苏词、苏文研究远逊于苏诗,评及苏词、苏文者虽不少,却没有人为苏词、苏文作注。清代的苏轼生平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王文诰的《苏诗编注集成总案》,这实际上是一部极其详尽的苏轼年谱。

池泽滋子 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清代,苏轼研究的成就也很突出。山本北山在为日本朝川鼎(善庵)校《东坡先生诗抄》四卷(清周之麟、柴升编)撰写的《叙》中说:“坡公住于世也,其为人忠正,胸臆潇洒,事行磊落,以盖世才略,施出人意表之经济。每所经历,皆有功效。若杭州感其恩德特深,至今家家奉祀坡公像,与祖先无异焉。凡涉文事者诗文书画之类,公莫不一一通晓焉,称为千古伟人之冠冕……然观公生涯,得意之日少矣。小之直言正论忤权贵,屡逢黜谪;大之罹诗祸,下冤狱,几死仅免。权臣恶公甚,大禁公学,集焚公书,至并与藏公书者罪之,名列党籍,身终异乡……既已,虽禁公文,公文益明;虽焚公书,公书益贵;虽欲毁公名,公名益高,岂非天所报不薄耶?”此《叙》颇能代表江户时代对苏轼的尊崇。当时在日本刊行的苏轼别集很多,如《东坡文抄》二卷,赤松勋(兰室)编,文化元年(1804)刊;《苏长公小品》四卷,明王纳谏编,布川通璞校,弘化年间(1844—1848)刊;《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二十八卷,明茅坤编,安政五年(1858)刊;《东坡先生诗集》三十二卷、《东坡先生年谱》一卷,宋王十朋编,明陈仁锡评,正保四年(1647)刊。又有日本人的新编本,如《新刻拔粹分类苏东坡绝句》七言、五言各一卷,山本泰顺(三径)编,宽文八年(1668)刊。

曾枣庄 在日本大量有关苏轼的选本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什么书?

池泽滋子 我认为是日本赖山阳的《增评唐宋八大家读本》和《东坡诗钞》。赖山阳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中国乾嘉考据学派盛行的时候,也是中国校注、评点苏诗成风的时候。赖山阳姓赖,讳里,字子成,通称久太郎,号山阳外史。原籍艺川竹原(今日本应岛县),安永九年(1780)出生于江户港(今东京)。其父讳惟完,字千秋,号春水,先后在大坂、广岛等地授徒。山阳才识天授,而又精勤不倦。一日因曝书,见东坡《史论》,叹曰:“天地间有如此可喜之文乎!”遂肆力于文章。年三十二游京师,遂居于京。终生不仕,诸藩多荐之,皆固辞不应,以授徒、著述为业。治家俭素,不妄费一钱。庭中杂植梅花竹树,扶疏为荫,置一草堂,临水面山。喜出游,名胜古迹,游履殆遍。天保三年

(1832)以积劳成疾而卒,年五十三。赖氏一生著述甚富,著有《日本外史》二十卷、《日本政记》二十卷、《通识》二卷、《春秋讲义》若干卷、《先友录》一卷、《文集》十卷、书后题跋四卷、《日本乐府诗》一卷、《诗钞》八卷、《同遗稿》八卷。此外还有《唐绝句选》二卷、《谢选拾遗》七卷、《宋诗钞》八卷、《杜诗评钞》四卷、《彭泽(陶潜)诗钞》一卷、《韩昌黎诗钞》四卷、《东坡诗钞》三卷、《锦绣段选》一卷、《浙西六家诗钞》六卷、《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十六卷、《评本文章轨范》七卷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当为《日本外史》。

曾枣庄 《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有何特点?

池泽滋子 《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三十卷,是在沈德潜评点的《唐宋八大家读本》上,加上自己的评论。在每篇文章上,包括《序》和《凡例》在内,基本上都有他的评语。第一,强调“苏家妙诀”,认为苏轼《论范增》本苏洵《管仲论》:“笔法盖其家传文诀也。”“转捩一语(指‘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极有力,尤妙在未言尽而再转,是等处苏家独擅。”“三苏每每以虚字书数言,一反一正,驾空立论,而切入人情,是亦其一家妙诀,如此篇‘天下皆为而已不为’是也。”(《策略四》)“前说未了,忽出后说,是苏家纵横手段,韩、欧诸公所未知也。”(《决壅蔽》)“乐富贵乐贫贱以一字联合,两句对待变化,此法自《战国策》来,苏家每用。”(《上梅直讲书》)赖山阳有时还把三苏的风格进行比较论述:“观东坡之文,要看其用笔爽朗无荆棘,任口议论,自成篇法。是其所以异于老泉、颖滨也。”(《大臣论上》)“大苏策论不如小苏之纡曲,难寻端绪,所以为大苏。”(《策略四》)“三苏并长于譬喻,而长公最妙。”(《决壅蔽》)第二,强调“东坡本色”。“叙事空阔清旷,非坡公无此笔气。”(《放鹤亭记》)“笔墨潇洒处是其本色,非故意模史迁者。”(《方山子传》)“‘公昔骑龙’起得突兀奇幻,非坡翁谁能道出?一歌虽摹韩(愈),其飘逸清雄处,是东坡本色。”(《潮州韩文公庙碑》)“比喻妙,妙在随笔出之,不费思此,这翁独擅技俩。”(《答李端叔书》)“非坡翁不能形容至此,所谓‘兔起鹘落,少纵则逝’者,意翁作文亦然。”(《书蒲永升画后》)“是坡翁一生本领,故言之玲珑透彻如此。”(《超然台记》)赖氏常以“仙才”评苏轼:“此段单说‘绝之则不用’,却添‘用之则不绝’一句,读者不觉是坡文,所以仙

也。”(《无沮善》)第三,赖山阳对苏轼的某些文章也不满意,反对“昔人满口颂赞”。“公作集序总不及老欧。此篇为欧作集序,宜属其极力苦思之笔,而不满人意,余不敢雷同昔人满口颂赞也。”(《六一居士集序》)“此篇虽有脍炙人口之语,蹊径毕露,非坡文之至者,余不甚喜也。”(《宝绘堂记》)

曾枣庄 《东坡诗钞》有什么特点?

池泽滋子 第一,只选古体。《东坡诗钞》是《韩苏诗钞》的一部分,《韩苏诗钞》含《韩昌黎诗钞》四卷,共收韩诗六十三篇,七十首。《东坡诗钞》三卷,卷数虽较《韩昌黎诗钞》少,但收诗数量还略多一些。共收六十六篇、八十八首。《韩昌黎诗钞》五古、七古、七律、五绝、七绝均选,而《东坡诗钞》仅选五古和七古,近体诗一首未选。为什么赖氏选韩诗,几乎各体皆选,而选苏诗却只选古体呢?因为苏诗虽各体皆工,但毕竟以古体见长。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一说:“诗莫难于七古。七古以才气为主,纵横变化,雄奇浑灏,亦由天授,不可强能。”苏轼正是以才气而名闻古今的,这大概就是赖氏不选苏轼近体诗的原因吧。《韩昌黎诗钞》仅卷二所收七古有评,卷一、卷三、卷四无一评语,有评者不足所选诗的三分之一。《东坡诗钞》却卷卷有评(下简称赖评),八十八首中,六十六首有评,占所选诗的四分之三。第二,赖评认为苏诗学韩,有不如韩诗处,也有胜过韩诗处。中国有不少学者曾指出苏轼学韩,如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评《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盘空硬语,具体昌黎。”评《送李公恕赴阙》:“选词琢句,多出昌黎,激昂豪奇,得骨得髓。”赖氏也认为苏轼有意学韩,有意要超韩。其《书韩苏古诗后》云:“苏古诗,有意与韩斗,不特《石鼓》、《听琴》也。《海市》斗于《南岳庙》,《赠簟》斗于《谢琴》。以余观之,《石鼓》交绥(交战而势均力敌),其余皆似输一筹。且‘汴州乱,雉带箭’,‘东方半明’等,苏集无此健调。然至《馈岁》、《守岁》、《泛颖》、《眼医》等,韩集亦无此妙语也。”赖氏认为,苏与韩“斗”的结果,不少输韩一筹,但也有不少是韩集所无的“妙语”。第三,赖氏曾以“东坡本色”评苏文,也常用“东坡本色”、“自是坡翁语”评苏诗。所谓本色指苏诗固有的特色。苏轼之为苏轼,就在于他胸怀坦荡,其诗多直抒胸臆,毫不虚情假饰。《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

僧》有“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句,赖评云:“自是坡翁语。”评《宿临安净土寺》“平生睡不足”云:“坡翁惯家语。”苏轼《雨后行菜圃》是为雨后蔬菜茁壮生长而作,赖评云:“(已作杯盘想)东坡本色。(芥蓝如菌蕈)以下极细腻。余音一结出意表,自东坡本色,而意归到小摘山僧句(小摘饭山僧),短篇宜有此转环处。”这里两次提到“东坡本色”。评《东坡八首》中的“荒田虽浪莽”一首云:“奇绝佳绝,此坡公本色。”评“自昔有微泉”一首中的“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荃”云:“此公本色,非公不能言者。”评《初秋寄子由》的起四句“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云:“何等起手,四句真是这老本色。”可见赖评苏诗对“东坡本色”确实十分重视。苏诗虽以直抒胸臆为特色,但也有以含蓄不露见长者。赖氏《书韩苏古诗后》云:“世服苏之广长舌,不知其收舌不尽展者更好。《试院煎茶》、《食荔枝》、《林逋诗后》、《考牧图》、《韩幹牧马》、《赠写真何充》、《秧马》、《砚屏》、《墨妙亭》、《藏墨》、《画竹》、《谢铜剑》、《横翠阁》、《烟江叠嶂》,皆丰约合度,姿态可观。《谢迺英赐御书》、《赠写御容》者,最庄雅精炼。《别子由》诸作,皆真动人。要看谑浪笑傲其貌,铁石心肠其神也。”苏轼善戏谑,爱开玩笑,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云:“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兴生感,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赖评是把握住了苏诗这一特点的,称其《别岁》“用恢戏笔。”称《韩幹马十四匹》“诙谐,不如前诗(《书韩幹牧马图》)之严正可法,而今选之者,徒取其本色耳。此诗无一句渊源古人之作者,是东坡自我作古之意。”评《大风留金山两日》“却笑蛟龙为谁怒”句云:“嘲笑语调,古来今,东坡一人耳。”第四,赖评常赞苏诗的结构,如评《初秋寄子由》:“自情事起笔,全篇惟是言宿昔之事,而其言即时之景,止结末二语,是此诗之妙,后觉所可法。全诗四句一解,六解六韵,亦是五古变体。”“看此诗(《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要看其首尾相贯、神气流通、常山蛇势处。”论苏诗的起结云:“公诗起处每佳,以景起,以景结。”(《秋怀二首》)第五,常赞论苏诗用韵之佳,如“押韵之切如此者,皆见其诗之妙。”(《再过泗上二首》)或称其换韵:“五古每四句换韵,其法自六朝来。”(《送运判朱朝奉入蜀》)或称其一韵到底:“一

韵到底,无一字强押,是作者极力者。”(《定惠院海棠》)“一韵到底,每章似换韵,是此诗之妙处。”(《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曾枣庄 苏词在南宋已传入日本,日本研究苏词的情况如何?

池泽滋子 日本填词是从嵯峨天皇(1242—1245)御制《渔歌子》五阙开始的,此后日本填词并不兴旺,更没有研究苏轼词的专书。江户时代中期的田能村孝宪(1777—1837),号竹田,可以说是在日本研究宋词的先驱。他著述颇多,其《填词图谱》是据清人万树《词律》撰成。共收入116调,其中收有两首东坡词《阮郎归·初夏》、《双调南乡子·重阳》。其《填词图谱自序》云:“宋人以为,词者诗之余也。诗既为文章之一途,又以此称之,最戈戈者也哉。况于本邦,固为无用物耶。士人不敢专攻其业,殆束阁焉。然于古人中,要之有前中书亲王《忆龟山》之词,盖王夙好文学,才藻典丽,罹时不淑,退隐西山,掩关却扫,因制此词,寄调《忆江南》也。读之,词之悽惋,世与《菟裘》诸赋并传,当推以为我邦开山祖也。有祖无传,尔后绝响,一千年于兹。宪(田能村孝宪)也禀性碌碌,躬遇泰运之日,进则无任官之能,退亦无耕野之业,拘拘乎雕虫刻鹄之末,偷生于艺林菁华之际。往日养病竹田书屋,汤药余暇,辑诸图谱,参订斟酌,总为六卷,摘句选声,娱乐遣日。”

五、近百年来中日的苏轼研究

曾枣庄 最近一百年来(1911—2010),中国的苏轼研究再次经历了由凋落到“复炽”的过程。前四十年战乱频仍,苏轼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惟一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苏轼传》影响颇大。继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苏轼研究有种种禁忌。苏轼“身后”对他的“议论”的确是“常公”的,但也有两次是极其不公的。一是苏轼刚死的宋徽宗时,诏毁苏轼文集。但即使在徽宗朝,也有人敢于传播苏轼集。费衎《梁溪漫志》卷七载:“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阖者(守门人)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司马懿),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

篇谁爱惜,六丁(火神)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二是上世纪大革文化之命时,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给他加上反动派、顽固派、典型投机派等种种恶名,苏轼研究几乎完全中断。但最近三十年,苏轼研究全面复兴,取得了可与清人媲美的成就,成为苏轼研究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孔凡礼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及其颇为详尽的《苏轼年谱》。苏词注本,长期以来就只有傅幹《注坡词》以钞本传世,直至1993年巴蜀书社才出版了刘尚荣整理的《傅幹注坡词》。近数十年来,校注苏词成风,有龙榆生《东坡乐府笺》、郑向恒《东坡乐府校订笺注》、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1980年成立了苏轼研究学会,已先后开了二十一次苏轼研讨会,对团结国内外的苏轼研究者,推动苏轼研究的发展起了大作用。

池泽滋子 中日的苏轼研究有同有不同,相同的是日本和中国一样都热爱苏轼,不同的是中国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徽宗朝的禁毁苏集,上世纪批林批孔批苏轼,在日本都几乎没有什么反响。而由于为大海所隔,日本没有赶上中国南宋、辽、金、元的苏轼热,苏轼著述在他去世后不久就传入日本,但日本真正研究苏轼,是在中国的明、清时期才开始的,近百年内日本的苏轼研究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的反复。土屋弘1911年编有《新释详注苏东坡诗选》,1917年又编有《苏诗选详解》;1928至1931年,岩垂宪德、释清谭、久保天随译注有《苏东坡诗集》;1965年仓田淳之助、小川环树编有《苏诗佚注》;1972年小川环树、山本和义译注有《苏东坡集》,1975年二人又有《苏东坡诗选》。村上哲见1968年有《诗与词(苏东坡)》,1989年又有《苏轼·陆游》。日本早稻田大学内山精也主持的宋代文学研究会,团结了一批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宋代文学,研究苏轼,在他们办的《橄榄》杂志上,1998年第七号、1999年第八号上有《苏轼的文学》专题。还有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保刈佳昭《新兴与传统·苏轼词论述》(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专书。

曾枣庄 你出版有一本《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所反映的也主要是日本近百年的苏轼热。

池泽滋子 日本人一直很尊崇苏轼。每到苏轼生日,日本的“东坡迷”都要举行寿苏会,撰写纪念诗文。其代表是长尾雨山和富冈铁斋。长尾雨山(1864—1942)名甲,字子生。书法家,诗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富冈铁斋(1836—1924),名百炼。南画家,石上神宫、大鸟神社的宫司。他和苏轼同日生,因此用“东坡同日生”、“东坡癖”等图章,室号“聚苏书寮”。他们热爱苏轼,收集有关苏轼的书、画、文具、古董等所有东西。在苏轼的生日开过五次“寿苏会”(1916年,1917年,1918年,1920年,1937年),先后刊刻有《乙卯(1916)寿苏录》、《丙辰(1917)寿苏录二卷》、《丁巳(1918)寿苏录二卷》、《己未(1919)寿苏录》、《丙子(1937)寿苏展观目录》、《寿苏集》(1937)。参加第一次“寿苏会”的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山本竟山、罗振玉、王国维、狩野直喜、上村观光等中日文人学者。西村天囚(1865—1924)在《乙卯寿苏录序》中介绍长尾雨山和他对苏轼的敬爱说:“琦长尾子生,负高明之资,挟奇伟之才,而困顿坎坷海外十余年。既归,侨居京都。绝志当世,翰墨自娱。生平深慕苏文忠为人。大正丙辰一月二十三日,即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为文忠生日。乃与福冈君谋,柬招亲朋,设寿苏之燕(宴)于东山清风阁,壁挂画像,坐陈遗墨法帖之属,抚古论今,畅叙竟日,洵为一时胜会。”

曾枣庄 在苏轼生前就有人作《鹤南飞》为苏轼祝寿。苏轼《李委吹笛并引》:“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巢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要(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其后历代都有人为苏轼祝寿,翁方纲(1733—1818)晚年名其室曰苏斋、宝苏室,每年东坡生日都要焚香礼拜,有《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同人集苏斋拜像作》、《雪后苏斋作,坡公生日,用苏韵二首》、《十二月十九日苏斋拜先生真像三首》等诗。陈衍也有《东坡生日陶斋尚书招集宝华庵,成长句七百字》诗:“公生八百七十五岁,公卒八百有十年。犹令后人

此景仰,菜羹羊肉非浪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菜羹羊肉非浪传”本此。韩国文人也常为苏轼祝寿,如与翁方纲相友善的申纬(1769—1845)就有《十二月十九日重摹赵松雪画东坡遗像》、《十二月十九日之翌日,追作坡公生日》、《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余适恩补海上》、《腊十九坡公生日,用墨农进士所视轴中韵》、《翌日蕉硯追作坡公生日诗寄来为谢答》等诗(本对话所引韩国有关苏轼的资料,均转引自洪钦所撰《苏轼研究史》第九章)。

池泽滋子 除寿苏会外,日本文人为纪念苏轼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还常开赤壁会。西村天囚在《乙卯寿苏录序》说:“昔者柴野栗山为幕府讲官,每岁后赤壁之夕,邀客置酒。享和壬戌,干支适同,因张盛燕,乐翁源公,赠以鲈鱼,时人荣之。”日本文人的赤壁游不止一处,东京千代区神田川的对岳台,大阪市都岛区的樱宫,京都宇治市的菊屋,都举行过赤壁会。如(一)宽政十二年(1800)柴野栗山在他居住的对岳台举行的赤壁会,以《庚申十月望,栗山堂会诸子,便题后赤壁图,分“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字为韵》为题,古贺仆、仓成茎、赤崎祯幹、辛岛宪、万波俊忠、桦公礼、赖惟柔等人皆有诗。(二)享和二年壬戌(1802)十月十五日,柴野栗山再次举行赤壁会,角田简的《续近世丛语》云:“柴野栗山常钦慕苏公,每岁十月之望,置酒,会客,以拟赤壁游。”又云:“壬戌夕会诸名士。白川越中侯闻之,寄书遗鲈,以求坐客诗。栗山使肥后辛岛井为之记,一时传写以为雅举。”当时有一客人携一块石来,栗山一见激赏,名以小赤壁,并援笔赋《小赤壁》古调一篇。醉墨纵横,一坐竦动。来客以为是给自己的赠诗而拜之,栗山也拜其石曰:“此吾家之物也。”遂收之,一时传为佳话。关于“小赤壁”水石,赋咏颇多。后来赖春水的儿子赖山阳写了一篇《小赤壁记》。(三)享和三年(1803)也曾举行赤壁会,有古贺精里《癸亥十月望三近堂集得脱字》等诗。(四)文久二年壬戌(1862)大阪湾的淀川举行赤壁会,池内陶所(1814—1863)撰有《前赤壁集字诗十二律并引》、《后赤壁赋集字诗十五律并引》。(五)大正十一年(1922)长尾雨山的赤壁会,聚集了全国各

地二百左右的文人墨客。当天使用的茶具都是中国式的,提供的茶是从东坡当过太守的杭州送来的龙井茶,酒是中国名酒绍兴酒,充满着中国情趣。赤壁会所作诗文,或谓今日之景正似当年苏轼赤壁夜游之景,如候田鹏斋《壬戌九月泛舟台下拟赤壁游》:“正是今兹壬戌岁,长江依旧有声流。山鸣谷应当年啸,月白风清此夜游。遗垒高临千尺岸,沉钟空咽九重湫。霜天四顾夜将半,孤鹤横空掠小舟。”或谓应像苏轼一样超脱,无须为当前处境烦恼:“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波。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是非消尽方遗我,哀乐何为更问天。相与目中空一世,斯游安得不邀然。”或叹物是人非,景似当年苏轼所见之景,而再也见不到苏轼其人:“渺茫不有水波兴,棹泝长流天可登。明月清风共舟酌,浩歌舷饮扣舷凭。江山为赋人安在,壬戌遇秋吾未曾。况是樽中盈美酒,雄怀何必羡兰陵。”或谓东坡赤壁远胜周郎赤壁:“与客泛舟自孤,秋光洗得酒怀苏。横天一水长清虚,在望千山方郁乎。人海风波游何止,世间声色有如无。怀须游乐寄明月,笑彼旌旗接触舳。”或谓有了东坡赤壁,人们就对周郎赤壁没有兴趣了,市河宽斋(1749—1820)的《题东坡赤壁图》云:“孤舟月上水云长,崖树秋寒古战场。一自风流属坡老,功名不复画周郎。”明人文徵明(1470—1559)《题画》诗:“秋清山水夜苍苍,月出波平断岸长。千古高情苏子赋,东风谁更说周郎。”两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曾枣庄 九百多年来,以苏轼贬官黄州,夜游赤壁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也数不胜数。在数以千计的歌咏赤壁的诗词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歌颂东坡赤壁。苏轼明明知道黄冈赤壁未必是“三国周郎赤壁”,但他根据“人道是”,故意把它联在一起,借以抒发怀抱。清人朱日浚《赤壁怀古》说得极好:“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后代诗人也就将错就错,爱把东坡赤壁和周郎赤壁联系起来抒发感慨。元人陆文圭《赤壁图二首》称苏轼文辞可敌周瑜的武功:“公瑾子瞻二龙,文辞可敌武功。”甚至超过周瑜武功:“却怪紫烟烈焰,不如白月清风。”戴良《题赤壁图》更笑赤壁图不写周瑜的赤壁之战,却写苏轼的赤壁之游:“千载英雄事已休,独余明月照

江流。画图不尽当年恨,却写苏家赤壁游。”张之翰《赤壁图》谓正是苏轼被贬,进一步成就了他的文学成就,我们才能读到《赤壁赋》:“战舰烟消几百年,江山风月属坡仙。玉堂果有容公处,二赋何由世上传。”明人方孝孺的《赤壁图赞》说:“群儿戏兵,污此赤壁,江山无情,犹有愧色。帝命伟人,眉山之苏,酌酒大江,以涤其污。”群雄争霸,玷污了赤壁,苏轼的“一樽还酹江月”,才洗涤了赤壁的污迹。方孝孺未必不知道黄冈赤壁并非“群儿戏兵”之地,他不过借此抒发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群雄争霸的不满罢了。元、明、清有关苏轼的戏剧近三十种,其中约三分之一也是以苏轼贬官黄州为题材的,如《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元费唐臣)、《赤壁记》(明黄澜)、《赤壁游》(明许时泉)、《游赤壁》(清车江英)等等。历代的书法家也以临摹或重书苏轼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黄州寒食帖》为乐事,历代的画家如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唐寅、仇英都画有东坡游赤壁图。明代还有一位民间雕刻家的微雕,在拇指大小的一块桃核上,雕了一只船,船上有东坡、佛印、黄庭坚和两位船工,并刻了前后《赤壁赋》中的名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字,成为一件艺术珍品。为什么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样醉心于苏轼的赤壁之游,创作了这样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来歌颂苏轼呢?这是因为苏轼“忠而见谤”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他们的深切同情,而苏轼贬官黄州期间的高风亮节和文学成就,更赢得了人们的无限仰慕。近世朝鲜前期文臣李荇、朴淹、洪彦忠、南滚等,也把汉城东边一个汉江绝壁(俗称蚕头)设想为中国的长江赤壁,并在那里泛舟,充满苏轼赤壁风流的浪漫。李荇《七月既望之夜,泛舟汉江,玩月有作》说:“拟把汉江当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韩国的“赤壁”也不只汉城蚕头一处,大邱有花园赤壁,安东有芙蓉台赤壁,七月既望的船游习俗,就是模仿苏轼《赤壁赋》而形成的民俗。

池泽滋子 日本万波俊忠诗云:“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前句谓赤壁之游不必问时间,后句谓不必问地点,看来日、韩文人都同意中国朱日浚“赤壁何须问出处”的观点,真是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 山木